

# 调整与转型: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变迁

曾 玲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 在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变迁中,数百个华人宗乡社团在新加坡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置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中国和亚太地区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从认同形态、组织结构、运作内容以及未来趋势等方面,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变迁。

**[关键词]** 新加坡; 华人宗乡社团; 调整与转型

**[中图分类号]** D6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072(2005)01 - 0106 - 09

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最南端,是一个由移民社会发展而来的多元种族国家,其人口中以华人占绝大多数。根据 2000 年出版的新加坡年鉴的统计资料,截止 1999 年,华人占新加坡全国总人口的 76.9%,其余为马来族、印度族及其它民族。

新加坡社会发展经历了殖民地时代和本土社会两大历史阶段。在移民社会,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政策,华人社会处于半自治状态。<sup>[1](P54-72)</sup> 华人移民必须建立自己的社团和组织,方能维持华人社会之运作。<sup>[2]</sup> 在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独立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变迁中,数百个华人社团在新加坡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运用报刊、档案、华人社团特刊等文献,以及与笔者长期在新加坡所做的田野调查资料,讨论当代华人宗乡社团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契机,在认同形态、组织结构、运作内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诸方面的变迁问题。

## 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契机

(一)新加坡建国以来华人社会与宗乡社团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从 1965 年建国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华人社会面临种族与文化认同的危机,以及宗乡社团被边缘化等许多严重挑战。

建国初期,新加坡政府基于岛内外诸种因素的考量,全力运作塑造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新加坡是个没有土著和本土文化根源的移民社会,从 1819 年开埠到建国不到一个半世纪。在这样的根基上建国,如何凝聚和塑造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是关系到这个年轻共和国能否生存的要害问题。就外部环境而言,二战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以及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华人占多数的国家、而又地处马来回教世界包围中的地

**[收稿日期]** 2004 - 11 - 20

**[作者简介]** 曾 玲,女,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根据吴华《新加坡华族会馆志 上、中、下》(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 - 1977 年出版)的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新加坡有会馆、宗亲会和行业公会近 600 所。另外,当代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属下的会馆和宗亲会有 190 所。

缘政治特征,使得新加坡的执政者在建国之初要极力避免背负“第三中国”的嫌疑和与马来回教世界的种族矛盾。受制于以上种种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局限,新加坡政府的应对之策是置种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下,特别是淡化和抑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群体的文化认同与种族认同,以此来强调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和对国家认同感。

为了达致目标,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发展经济、解决失业、屋荒等民生问题;进行市区重建,借以打破殖民地时代具有种族和方言帮群特征的居住方式,同时实行各族群聚集的政府组屋分配;建构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所、居民委员会等新的社会网络等项,试图建立超越种族和帮派的社会文化形态,将各种族各族群团结在国家的旗帜之下。

在建构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各项政策中,对华人社会冲击最大的是语言和教育政策。为了以国家认同取代种族认同,新加坡政府延续殖民地时代偏重英文的政策,大力发展英文教育,加强英语在政府、商业、资讯、社会等各方面的运用。政府重视英文的政策迫使家长纷纷为孩子选择英校,最终导致华校解体。从1959年起,华校小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到了1987年,政府实施统一源流的教学,推行以英文为教育媒介语、母语为第二语言的双语教育政策,并且让唯一的中文大学——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从此华校系统在新加坡的土地上消失。双语教育虽然让华人年轻一代掌握一定程度的华文,但由于整个社会重英文轻母语的倾向,华文水平日趋低落。

华人宗乡社团面临的危机问题是华人社会边缘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在半自治的殖民地时代,华人建立诸如会馆、宗亲会、行业公会、华商俱乐部等各类社团和组织,以维持华人社会的运作。透过这些社团和组织,华人社会担负起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功能,这包括兴办学校、修建医院、坟山,照顾华人移民的生老病死,解决年轻一代的教育问题等项。宗乡社团的另

一重要使命,是在华人社会宣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和传统习俗。上述功能的存在是宗乡社团在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

当新加坡建国后,华人社团基本的社会功能被政府所取代。自1959年执政至今,人民行动党政府提供了国家的政治领导层。国会议员取代各种族和方言帮群的领导人,成为人民的领袖和代议士。至于华社,殖民地时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作为华社最高总机构的角色已经式微。政府也取代华人社团,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社会提供教育、医药护理、公共坟场和火化场以及老人院和收容所等一切公共服务设施。由于基本社会功能的丧失,作为华人社会支柱之一的华人宗乡社团在建国后的社会定位受到严重挑战。

上述重大的社会变迁,使建国后的华人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对华人种族和文化特征的压抑,造成年轻一代新加坡华人对种族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淡漠。1999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811名年轻华人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选择来世做白种人或日本人,而不做华人。由于政府和社会对英文和英文教育的重视,以及华文教育低落和中华文化认同淡化,加剧了根源于殖民地时代的华人社会内部两大教育源流社群即受英文教育(英校生)和受华文教育(华校生)的分裂和对立。这两大社群在社会、政治、文化以及身份认同意识等方面差异很大。<sup>[3]</sup>与此同时,伴随华人社会种族与文化认同危机而来的是华人宗乡社团的边缘化。殖民地时代承担许多社会功能、而且是华人得以保留中华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基本和重要阵地的宗乡社团,也因作为建国后政府以国家认同取代种族认同的一系列政策的对立面而成了牺牲品。统计数据显示,独立后10年,没有出现新的会馆和宗亲会。而原有的宗乡社团中一部分已自行解散,大多数则面临运作经费短缺、会务停顿、会员老化、后继乏人的困境。

面对建国后的社会变迁给华人社会带来的

种种危机和挑战,一个调整自己、寻找契机的历史任务摆在华人社会的面前。

(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亚太和新加坡的变迁与华人社会的发展契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由于世界冷战结束、尤其是亚太地区急剧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新加坡政府对社会、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政策的调整,使华人社会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最重大的变化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崛起。这一巨大变迁不仅使包括新加坡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人经济与华南侨乡重建了密切的经贸联系,亦为新加坡华人振兴社会与文化注入了强心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拓展,也使新加坡和东南亚各国政府意识到,华人社团宗乡文化的认同,是建立全球性经贸网络的文化纽带,因而宗乡社团的存在和全球性的跨国活动,有助于促进所在国经贸的发展。

在新加坡,建国 20 多年以来政府所推行的有关以国家认同取代种族认同政策,虽然对促进新加坡社会各族群的整合与凝聚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少消极的问题,其中最让李光耀和国家领导层担心的是,由于偏重和强调英文,以及英文的广泛运用,导致新加坡迅速西化,年轻一代华人淡化甚至抛弃中华文化,转而接受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颓废文化。为此他们转而向中华文化寻求道德支援,以抗拒所谓的“西方歪风”。20 世纪 70 年代末,新加坡政府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80 年代设立中学儒学课程,到 90 年代又宣布新的华文教育政策,让华人学生有更多修读较深华文的机会。

在文化政策上,新加坡政府也做了重大调整。20 世纪 70 - 80 年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重建正常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消除了新加坡担心背负“第三中国”的疑虑。特别是 1990 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两国经贸文化联系顺利发展,需要政府重新思考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关系。亚太和区域社会经贸格

局的改变,促使新加坡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对其文化政策进行调整,改以多元文化政策以取代建国前期推行的抑制种族文化政策,鼓励各民族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与传统。<sup>[4](P4-5)</sup>对华人社会,政府提倡和支持华人社团举办诸如新春团拜、中秋节提灯笼、猜谜语、清明祭祀祖先等传统民间文化活动。政府将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任务交给华人社会,尤其是宗乡社团。换言之,在新的历史时期,华人传统宗乡社团被赋予传承华族文化的新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发展危机虽未解除,但新的发展契机已经展示在面前:新加坡政府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而调整的政策,为宗乡社团发展解决了制度上的问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区域的稳定、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宗乡社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和跨境发展的新空间。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正是在上述历史变迁脉络下开始其发展历程。

## 二、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认同形态

认同形态深刻影响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发展状况与未来发展趋势。当代华人宗乡社团的认同形态包括社群、社会认同,以及在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认同等内容。

(一) 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社群与社会认同

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认同形态,是伴随新加坡社会发展变迁而不断演化。在殖民地时代,当华人移民背井离乡南来东南亚拓荒,因生存之需组成了各类组织和社团,他们的社群认同意识也随之产生。虽然华人移民的社群认同多以祖籍文化资源为纽带建构,但由于社会文化脉络的不同,这些认同意识不可避免具有本土特色。以新加坡的情况来看,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华人移民的帮群形态从初步形成、

调整到确定,华人社会在新加坡已经基本建立。<sup>[5]</sup>而因应帮群社会结构特征而产生的华人“帮群意识”、“帮群认同”,则是华人移民在新加坡殖民地时代产生的社群认同形态。

随着新加坡结束殖民统治从移民时代进入本土社会,这些产生于移民时代的华人认同形态也在新加坡社会变迁的脉络下不断演化。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新加坡政府强力建构公民的国家意识,以及建国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里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都使包括华人在内的新加坡人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很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作为新加坡的华人宗乡社团,对新加坡国家与社会的认同感也随之产生。

在建立对新加坡国家与社会认同的同时,华人宗乡社团也延续和坚持传统的社群认同。华人宗乡社群认同是伴随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建立而产生的。在新加坡从移民时代到本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华人社团的认同意识对保留华人文化的根源,以及在新加坡发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社群文化如新加坡的潮州文化、福建文化等有着积极的意义。就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生存空间而言,面对建国以来不断被边缘化的危机,今天新加坡的数百个传统宗乡社团必须借助传统的社群认同来面对时代的挑战和增强社团凝聚力。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加坡政府对文化发展采取开放的政策,不仅鼓励各种族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反对华人社会内部保留各方言社群的文化特色,这为华人保留与延续传统的认同形态提供了有益的空间。而不同社群文化的并存与发展不仅丰富了新加坡的文化资源,亦有利于促进新加坡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笔者曾以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为研究个案,对华人宗乡社群在新加坡不同历史阶段的认同形态作一历史考察。<sup>[6]</sup>广惠肇碧山亭(以下简称碧山亭)由来自中国广东省的广州、惠州、肇庆三府移民创立于1871年。碧山亭是一个以“坟山认同”为纽带而建立的华人宗乡组织。在19世纪殖民地时代,碧山亭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广、惠、肇三属移民坟山管理机构,处理三属

先人的营葬、祭祀以及有关的事务。在作为坟山管理和丧葬机构的同时,从创立迄今,碧山亭也是新加坡广、惠、肇三属社群最高联合宗乡组织,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属下曾包括有新加坡广、客两个方言群的数百个祖籍地缘、姓氏血缘以及行业公会等社团。

作为一个具有近一个半世纪发展历史的华人宗乡社团,在殖民地时代,碧山亭通过“祖先崇拜”的文化纽带和建立“淡化社群认同差异”的组织机构,建构广惠肇社群的“三属认同”,由此促进三属社群内在凝聚力的加强。新加坡独立建国后,碧山亭伴随着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变迁也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碧山亭与三属社团继续坚持殖民地时代所形成的“三属认同”。与此同时,碧山亭也调整其社会功能、组织机构、运作方式,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显示出碧山亭与三属宗乡社群对新加坡的“社会认同”。

碧山亭与三属华人认同形态的演变显示,对新加坡的社会认同和延续与坚持传统社群认同并存,是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认同形态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在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认同

认同中华文化,对中国和祖籍地充满深厚的感情,是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在文化认同上的基本特征。

虽然新加坡经历了移民时代与本土社会的历史转变,但华人宗乡社团从未放弃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坚持,并以在新加坡传承中华文化为首要任务。面对当代新加坡日益西化的社会环境,华人宗乡社团对年轻一代淡漠中华文化和血脉根源的现状深感忧虑,十分关注政府的华族文化与华文教育政策,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呼吁政府关注中华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存续问题。同时调动和运用社团资源,开展各项与传承中华文化有关的活动。目前新加坡许多宗乡社团如福建会馆、海南会馆、金门会馆、同安会馆、福州会馆、晋江会馆等,都开设与中华语言文化有关的各类课程。以海南会馆为例。海南

会馆于 1988 年开设的文史班,迄今已坚持了 17 年。文史班讲授中国上下 5000 年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全部课程内容约需两年方能修完。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文史班开课至今深受新加坡社会的欢迎,目前每期学员已达 150 人之多。另一方面,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在坚持中华文化认同的大前提下,也不排斥或在某种程度上包容非华族文化。例如,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福建会馆联合开办马来语与闽南语会话班,为新加坡公众提供学习马来话与闽南话的机会。除了闽南语会话班,马来语会话班也很受欢迎,参加人数多达 103 人,分两班授课。学员都是华人,以专业人士和商人居多,其学习目的,85%的人是为了和马来同胞交谈,6%是为生意上的需求,5%是想了解马来文化,而和女佣交谈及观光只各占 2%。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团长方百成指出,“虽然会馆以举办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动为主,但同时也要为促进种族和谐与交流努力。马来语会话班的开办将有助于华族对马来族同胞的了解”。福建会馆还计划开办马来语会话中级班,从而让这个课程具有长期性和系统性。此外,如新加坡同安会馆开设了马来舞蹈培训班。海南社群的宗亲组织符氏社以中英双语出版 115 周年纪念特刊等等。

总之,在坚持中华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认同,是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认同形态上的另一重要特征。

### 三、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组织形态

在新加坡移民时代,华人社会以祖籍方言为基础,形成“福建帮”、“潮帮”、“广帮”、“客帮”、“琼帮”等五大基本帮群,呈现出“帮群结构”特征。<sup>[7](P28-62)</sup>新加坡建国后,华人社会内部的“帮群”分野已经逐渐淡化,但华人社团的基本组织形态被保留下来并延续到了当代。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组织形态呈现出一些变化:

#### (一) 宗乡社团对成员祖籍限制的放松

新加坡建国近四十年来,由于行动党政府强力培养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加上从 1987 年开始推行的以取代方言为主要目的讲华语运动,华人社会内部方言帮群的分野已经淡化。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一些宗乡会馆为了解决会员老化和吸引年轻一代华人参与等问题,开始放松会员的祖籍限制。例如,广府社群的冈州会馆的会员中,不仅已经包括了祖籍冈州以外的广府人,甚至有祖籍潮州、福建、客家等华人。当然,目前对祖籍限制的放松还仅限于会员。会馆的管理层如董事部成员等等,仍限制必须是祖籍冈州者方可担任。

放宽会员的祖籍限制是目前宗乡社团发展的一种趋势。对宗乡社团来说,这不仅是应对危机的策略之一,亦是在社会变迁下的调适。而社团对领导层祖籍地缘的坚持,则是华人坚持传统社群认同的结果。

#### (二) 组织机构的调整与领导层的变化

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在组织机构与领导层方面都出现一些调整与变化。

##### 1. 组织机构的调整与改变

华人宗乡社团的功能在新加坡建国后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社会的发展要求华人宗乡社团调整其组织机构,以适应时代的需求。以碧山亭为例。碧山亭作为广惠肇三属坟山管理机构的功能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因政府在 80 年代初征用了坟山,碧山亭进行重建,并改土葬为安置骨灰。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重建后的碧山亭修改章程,打破三属限制,向全新加坡各族群开放,继续造福社会大众。伴随碧山亭管理对象的变化与社会功能的扩大,碧山亭组织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殖民地时代,与坟山管理与葬地安排有关的建设组,在新章程里,被管理灵塔的保养科所取代;坟山时代碧山亭管理租户的租务组与调查组取消了,代之而设的是管理、发展碧山亭产业的发展科与产业科。20 世纪 80 - 90 年代以来,由于碧山亭的重建与投资工作繁重,碧山亭又设立两个临时机构建设发展委员会(简称建委

会)和投资发展委员会。教育组是二战后设立的主要机构之一,其任务是管理碧山亭学校。由于新加坡独立之后语言政策与教育制度的改变,新加坡宗乡社团所办学校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关闭了,碧山学校也在1981年结束其历史使命。1998年教育组为青年团取而代之。

在组织机构的调整上,目前新加坡许多传统宗乡社团最普遍的作法是设置青年团(股)(部)和妇女组,同时把一些二战前设置的旧机构如“互助组”等淘汰。如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同安会馆、晋江会馆、南安会观、安溪会馆、冈州会馆、应和会馆、茶阳会馆、福州会馆、福清会馆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透过青年团和妇女组,吸收年轻人参与会馆的活动,为会馆未来的发展注入新血。

## 2. 社团领导层的变化

根据会馆编撰的特刊及作者的田野调查资料,近十年来,新加坡宗乡社团领导层进入一个世代更替的时期。随着老一辈华人领袖如福建社群的孙炳炎先生、潮州社群的连瀛州先生等相继离世,一批二战后在新加坡本土出生和成长的华人逐渐进入社团的领导层。在这些新世代的领导成员中,包含了一些掌握中英双语专业人士和社会精英,其中有相当部分同时在新加坡的各类基层组织如民众联络所、社区中担任领导职务。以应和会馆为例,现任应和会馆理监事中,有好几位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博士和教授。如担任“正教育”的赖涯桥副教授。另一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研究院院长、同时兼任新加坡新工业园“科学工业”部门负责人的科学家张道昌教授亦是该会馆的会员。

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领导层的变化,以及对未来华人宗乡社团发展趋势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 三、宗乡社团的调整与整合

在经历了从移民时代以来近两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新加坡社会的快速

变化,对华人宗乡社团的发展规模与生存空间造成很大冲击。一些经济、人才等资源较为雄厚的地缘会馆如福建会馆、南洋客属总会、广东会馆、应和会馆、茶阳会馆等发展前景较好。但一些较小规模且缺乏资源的社团则面临生存的危机。特别是一些行业公会因所属的是传统行业逐渐被新的高新技术企业取代而趋于没落。例如,曾在二战后拥有6000多名会员的机器行,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行业公会之一。随着新加坡在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新科技和电脑取代手工的机器生产方式,传统的机器行业因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20世纪90年代末,机器行终因公会会员老化而随之解散。公会所剩的资产一半捐给广惠肇留医院、同济医院以及中华医院,另一半分给会员。公会的历史文物则送交博物馆与档案馆。

为了解决宗乡社团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为了在有限的资源上聚合宗乡社群的力量,当代新加坡华人社团出现整合与联合的新趋势。

事实上,有关华人社团的整合,也是新加坡政府的期待。1985年宗乡联合总会的成立,就是政府政策间接推动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宗乡总会属下有近200所社团,是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最高联合机构。

另一种整合是由华人社团自发推动和进行的,整合或联合的形式也很多样化,以姓氏宗亲会的跨地缘整合较为多见。如200年8月成立的陈氏总会,包括了颖川公所、星洲颖川公会、星洲陈氏公会、浯卿陈氏公会、四邑陈氏会馆、浮光陈氏公会、元光陈氏公会、官山呈美陈氏公会海南陈氏公会、潮安东凤同乡会、同美社等福建、潮州、海南、广府等各属的11所陈氏宗亲社团。<sup>[9]</sup>

华人宗乡社团整合的基本特点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其“分”在于各社团的组织系统与经济运作,其“合”则是共同举行一些活动。如祭拜先人的“春秋二祭”或晚宴、中秋节晚宴等。例如新加坡潮荷同乡会,其成员的祖籍地与冈州会馆同属广东新会地区,“潮荷同乡会历代先贤之牌位”亦放置在冈州会馆的神

龛中。由于会员逐渐老化等原因,同乡会决定其会员并入冈州会馆,但保留原有的会所和独立的组织和财政系统。

当代海外华人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全世界华人社团的联合。20 世纪 80 - 90 年代以来,透过推动、举办或参与在新加坡、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世界恳亲联谊大会,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也进入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网络。

#### 四、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运作

(一) 在新加坡寻求新的社会定位,力图摆脱被边缘化的困境

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在运作上关注本土社会的族群融合、华文华语政策、中华文化的传承等问题。例如,“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南安会馆、福州会馆等社团主动拜访马来回教堂,并邀请马来同胞参观会馆,以实际行动促进新加坡华族与马来社群的友好互动关系。

宗乡社团也配合政府政策举办有关的活动等。以碧山亭为例。华人社团如何在新时代找到历史新定位,是当前全新加坡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碧山亭在 1998 年周年纪念活动中,举办了一个“21 世纪宗乡会馆的使命”的研讨会。受邀参加的团体有马来西亚广肇联合总会、柔佛古来广肇会馆、新山广肇会馆、巴株巴辖广肇会馆、马六甲肇庆会馆、东甲广肇会馆、柔佛古来惠州会馆、柔佛惠州会馆、万里望惠州会馆、森美兰惠州会馆、沙叻秀惠州会馆、古晋广惠肇公会、马六甲惠州会馆、泰南勿洞广肇会馆等社团。研讨会讨论了在东南亚国家独立之后,华人宗乡社团的转型、华人宗乡社团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现代宗乡社团存在的问题等重要的议题。

对当代新加坡教育的关注,是目前几乎所有华人宗乡社团运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华人社团独立办学的历史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已经基本结束。但华人社团并未放弃对教育的责任。目前各华人社团每年都发放奖、助学金、贷学金给会员子女。以福建会馆为例。该会馆从

1997 年开始颁发大专奖学金,受惠对象不分种族、宗教、籍贯,一视同仁发放给全新加坡各族优秀人才。2001 年福建会馆颁发了新币 14 万元的奖学金给包括非华裔在内的 80 名优秀品学兼优的学生。此外社团在庆祝周年纪念之时,也透过捐款的方式,资助大学的研究计划、捐助全国性的慈善基金等。

(二) 承继传统以保留“根”源和发展华人文化

宗乡社团是华人社会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在殖民地时代,宗乡社团主要通过常年的活动来保留华人文化。这些活动内容中有相当部分是庆祝中国传统的民间节日习俗。如春节团拜、春秋二祭、中元普渡、中秋迎月等。建国以后,鉴于当时的局势,不少社团已经放弃或减少这些民俗传统活动。80 年代后期以来,为了配合政府多元文化和保留华人传统的政策,许多社团恢复或扩大了这些常规活动的内容。例如茶阳会馆从 2000 年开始恢复放弃多年的“春秋二祭”祭总坟,参与该活动的会员有数百人之多。会馆也举办了温馨热闹的春节团拜活动,除了会员和他们的亲人朋友,会馆还邀请来自大埔的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参与庆祝。团拜期间,会馆人员表演了客家山歌,参与活动的会员还可分得一份客家点心。另一客属的应和会馆从 1999 年开始也恢复了春节团拜。2003 年正月初三,笔者参与该会馆有数百人参与的盛会。在应和会馆深具客家宗祠风格的会所里,笔者见到好些家庭扶老携幼、老少三代一起参与这华人喜庆的节日。会馆还刻意安排应和家乡美食,以增强会馆成员的社群认同感。

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己任,是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共识。目前许多社团都展开与弘扬中华文化的活动。如福建会馆对属下五校华文教育的推动;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在年轻一代华人中培养中华文化人才;海南会馆常年举办中华文史班;广东社团发展粤剧、舞狮等中国传统戏剧和艺术;同安会馆的平剧社、中华诗词和书法班等等。可以说,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承和发展,宗乡会馆是一个基本和重

要的载体。

在保留华人传统文化中,传承和发展地方性的文化艺术是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在新加坡,福建社群有南音等、潮州社群有潮州大锣鼓等,客家社群有客家山歌等,琼州社群有琼剧,广府社群则有粤剧和狮团。在粤剧方面,东安会馆和冈州会馆成就最大。鹤山会馆、三水会馆、冈州会馆的狮团则在新加坡享有盛誉。2004年新加坡戏曲学院联合禾山公会、厦门公会、同安公会、南安公会、安溪会馆等五社团,携手开班“学歌仔戏,了解闽南文化”。戏曲学院院长蔡曙鹏说:“我们希望课程能吸引知识分子,一起来关心方言文化和戏曲传统”。这些对中国民间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加强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同,进而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重新凝聚华人对传统宗乡社团的认同。

80年代后期以来,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回祖籍地寻根。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祖籍地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20世纪中叶,因中新政治局势的变动导致了华人与祖籍地关系的中断。近10年来,几乎所有的华人宗乡社团都组织回乡访问团到祖籍地探亲访友,祭拜祖先和神明。根据笔者的调查,这类活动很受华人欢迎,有不少年轻人也随父祖辈加入回乡的行列,且有不小的规模。2000年同安会馆青年组主办了一个有数十人参加的回乡文化寻根团到祖籍地福建同安访问。2002年11月应和会馆组织的回乡观光团,有近百人参与。活动结束后,会馆还出版记录此次活动的会讯。

(三)以宗乡文化为联系纽带,拓展跨境发展的空间

当代海外华人社团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跨国化和全球化。其主要的途径是透过主办或参与全球性的联谊恳亲大会,广泛地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以及中国祖籍地建立联系网络。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在这一时代潮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和其他人文环境,新加坡的许多宗乡社团或者首先提出成立区域或世界性联谊大会的建议;或者与香

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社团联合,多年进行筹办所属族群的全球聚会的工作;有些则发起和主办了第一届世界恳亲或联谊大会;另有一些社团成为全球华人社团及其与中国祖籍地的网络枢纽和主要联络中心之一。<sup>[10]</sup>

跨国活动的展开对华人宗乡社团在新历史时期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宗乡社团以亚太和世界为视野的跨国活动,对拓展新加坡的全球经贸网络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宗乡社团在新加坡主办有数千人规模的世界恳亲联谊大会,也促进了新加坡旅游、旅馆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就宗乡社团本身来说,全球性的跨国活动,使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祖籍地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建立起制度化的联系网络。此种联系网络的全球性特征以及富有经贸意义的跨国活动,不仅扩大了宗乡社团在当代新加坡社会的影响力,也使宗乡社团有了新的功能定位,从而有助于摆脱建国前期被社会边缘化的困境。

#### 四、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 未来的发展趋势

根据笔者近十年来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考察,目前宗乡社团正处在危机与契机并存的重要时期,未来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状况;第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新关系的互动形态;第三、区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发展与变化;第四、新加坡发展方向与政府政策的变化,如对华文华语政策的调整等。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未来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可能会在既有的基础上向以下三个层面发展:

1. 在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为了摆脱建国以后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进行的调整与再生的历史过程仍方兴未艾。因此,未来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将会继续坚持与弘扬以民间传统与习俗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更加关注和参与新加坡社会发展,



强调和延续社群认同意识,积极吸收年轻新血以壮大社团,力争在新时代的社会舞台上找到新的定位,发挥重要的角色与社会功能。

2. 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十年代中新建交以后,华人宗乡社团全面恢复了与祖籍地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华人宗乡社团与祖籍地的经济文化联系正在迅速发展。近几年新加坡政府提出“搭中国经济发展顺风车”的呼吁,得到华人宗乡社团正面、积极的响应,不少会馆同乡会组团或正在组团到祖籍地和中国各地访问,寻找商机。可以说,利用传统的宗乡文化纽带,为会馆成员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是近来新加坡宗乡社团运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这个趋势的发展正方兴未艾,特别是 9·11 之后,新加坡经济面临建国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华人社团对新加坡商家进入中国场所具有的重要的桥梁作用越来越为新加坡社会所认同,这将进一步加强和促进华人社团与祖籍地全方位的联系。

3. 与世界海外华人社团的关系。在当代由于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全球化成为当代世界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然而,在科技的“网络”之外,世界各地的华人还有一条以宗乡文化认同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由于拥有这样共同的文化纽带,海外华人很轻易地跨出国门走出区域走向世界,以超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的族群符号来建构全球华人宗乡社群的群体记忆与国际化的组织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跨国性的商业贸易等经济活动。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已经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未来会朝着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并有可能出现实质性的经贸合作成果。

综上所述,考察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不仅要从华人社会本身着手,亦要注意整个新加坡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的状况,以及当代中国的变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向的时代脉络。换言之,必须在新加坡、中国和世界三个层面的脉络综合、全面地研究和把握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的发展趋势。

#### [参考文献]

- [1]吴凤斌. 东南亚华侨通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 [2]谢剑. 志愿性社团的组织原则:新加坡华人社团的个案研究. 载李亦园,郭振羽主编. 东南亚人社会研究(下册)[M]. 台北:正中书局,1985.
- [3]李元瑾. 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 载李元瑾主编. 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C].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
- [4]杨荣文. 献词载华人 华语 华文[C]. 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新闻艺术部,2000.
- [5]曾玲. 坟山组织、社群共祖与帮群整合——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J]. 亚洲文化,2000,(24).
- [6]曾玲. 新加坡华人宗乡社群认同形态的历史考察:以广惠肇碧山亭为例[C]. 载李元瑾主编. 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2002.
- [7]林孝胜. 新加坡华社与华商[C]. 新加坡亚洲研究会丛书,1995.
- [8]区如柏. 新加坡宗乡会馆回顾与前瞻[C]. 载总会十年. 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1995.
- [9]区如柏. 陈氏总会正式成立[N].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10-29.
- [10]曾玲. 认同形态与跨国网络:当代海外华人宗乡社团的全球化初探的讨论[J]. 世界民族,2002.

[责任编辑 王桃]

**Adjustment & Transformation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Singapore –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ZENG Ling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Singapore's development from a colony into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se clan associations in the period 1980 – 1990 against the growth of Singapore and China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The discussion will focus on organizations, operations and their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Singapor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Papers on Overseas Chinese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XU Yun

*Library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ecial databas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this thesis utilize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metrology of documents to emphatically analyze and appraise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which were published between 1980 – 2003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imes, themes, periodicals, areas, authors, etc. The result shows most of these were published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1990s. Since then the steady period has come. The heated topics has been about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the number of studies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has decreased, but the quantity of studies regarding the affairs has increased. The studied areas have focused on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the periodicals have been distributed extensively, but the rate of the key periodicals publishing the theses, was relatively low; the active author groups have been formed.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have gone through the stages from beginning, development, peak, to maturity. The field of its research is expanding constantly, and the trend of the multi – disciplinary cross research is prominent. The quality of the theses still remain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phenomenon of partiality for certain food” should arouse our attention.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literature evalu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subject database